

代际鸿沟与伦理审思

——论森鸥外《仿佛》中的家庭伦理

蔡 蕾 李先瑞

提 要：《仿佛》通过描写“父与子”——五条子爵与五条秀麿的微妙冲突，反映出代际关系的不协调主要来源于两代人在理解学问、宗教及政治等诸多领域认知上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揭示了子女与父母之间由于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选择难题。作者将家庭中的代际冲突与社会大历史相互叠合，作品中父子矛盾的背后亦有沉重的历史缩影，构成交互发动的历史叙事景观。本文首先考察精神上与国家保持高度一致的父亲及其立身之本，再梳理主人公的伦理纠葛及其背后的历史缩影，最后结合代际冲突的不同解决方式，进一步探讨近代社会家庭代际的伦理审思。

关键词：森鸥外；仿佛；家庭伦理

Intergenerational Gap and Ethical Reflection: On Family Ethics in Mori Ougai's *Kanoyoni*

Cai Lei Li Xianrui

Abstract: "Kanoyoni" depicts the subtle conflict between "Father and Son" – Viscount Gojyo and Hidema Gojyo, reflecting that the disharmony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mainly stems from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religion,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It reveals the selection difficulties caused by differences in values and other aspects between children and parents. The author overlaps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s in the family with the social history, and behind the father son contradiction in the work, there is also a heavy historical microcosm, forming an interactive historical narrative landscape. This article first examines the father who maintains a high degree of spiritual consistency with the state and the foundation of his identity. Then, it sorts out the ethical entanglements of the protagonist and the historical epitome behind them. Finally,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solutions to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s,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ethical thinking of modern families between generations.

Keywords: Mori Ougai; *Kanoyoni*; Family ethics

1912年，明治著名的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在《国民道德概论》中提出“综合家族制度”和“个别家族制度”。概括而言，单个家族的制度即个别家族制度，而把单个家族综合统一起来的国家制度就是综合国家制度。他指出，日本家族制度的特色就是“综合家族制度”（即把国家整体作为一个大家族，天皇是这个大家族的家长）。在“综合家族制度”下，把出自“个别家族制度”的孝的伦理推而广之，就成为“综合家族制度”中忠君的伦理。正因为日本有综合家族制度，才能实现孝与忠的完全统一，才有“通古今而不变的国体”^[1]。井上哲次郎所提倡的融合日本传统家族道德、儒家的忠孝之道、天皇万世一系的神道思想和德国的国家有机体观念所构成的“忠君爱国”的天皇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和“忠孝一本”的国民道德论在森鸥外发表的《仿佛》中均有所涉及，作品借主人公五条秀麿之口，针对“综合家族制度”、家族国家观等同时代思潮进行了反思与探讨。

作品《仿佛》发表于1912年1月的《中央公论》上，主要描述了曾留学德国的青年历史学者五条秀麿，信奉近代合理主义，企图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实证历史研究，将日本国史中的“神话”和“历史”相分离的事件。但这与其伦理身份，身为贵族子爵家嫡长子，理应站在以混淆神话和历史作为立论之本的皇制的立场，以混淆神话和历史作为立论之本，但这与其学术主张却完全相悖。主人公试图借用德国哲学家汉斯·费英格（Hans Vaihinger）的“仿佛哲学”来解决这困扰其已久的意识矛盾。这部小说是“秀麿文”的首发之作，所谓“秀麿文”，即描写明治末至大正初期，均以五条秀麿为主人公，就日本国家、社会的现在与未来，尝试进行思想性探索的短篇小说系列。

关于《仿佛》的先行研究，在日本学界历经三阶段。第一阶段，“体制拥护论”。作品主人公体现了“出生于自然科学和资本发达社会的人的颓废…缺乏探寻真理的勇气”，20世纪40年代起，以唐木顺三为首，对《仿佛》中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作者“为了模糊社会中的诸多矛盾采取了姑息策略”^[2]。中野重治的“森鸥外作为日本陈旧统治阶级服务的最高意识形态的代表”^[3]，更奠定了二战后相当部分学者对《仿佛》及作者森鸥外的批判论调。第二阶段，“体制批判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以小泉浩一郎、渡边善雄为首的学者提出了与前者截然不同的论点。“作品体现的并非是对天皇制的拥护和姑息的折衷主义，而是展现了无法协调社会既成秩序与合理主义的自我对立纠葛”^[4]，“作品通过秀麿与父亲以及秀麿与绫小路的对立，刻画了南北朝正统问题以来，本应寻求真理的史学的实证研究被刻意扭曲的时代。”^[5]作家作品论开始向肯定方向发展。第三阶段，“批判与拥护共存论”。作品“在暗示依靠神话来维持秩序的国家体制的非现实性的同时，也为近代国家更为健全发展的策略提供思考和借鉴”^[6]。也就是说，主人公的立场，并不是“体制拥护论”与“体制批判论”的二选一的抉择，而是两者的共存。这与其知识结构与伦理身份的矛盾性不谋而合，一方面，若从学术角度来探讨日本神话，必然会发现其虚构性，明治政府所推崇的以神话来维持秩序的体制有可能因此被动摇；另一方面，身为贵族子弟，追求学问和思想上的自由固然重要，但同时还需守护国家秩序的稳定。

本文的关注重点是《仿佛》中的家庭伦理。作品通过描写“父与子”——五

条子爵与五条秀麿的微妙冲突，反映出代际关系的不协调。主要来源于两代人在理解学问、宗教及政治等诸多领域认知上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揭示了子女与父母之间因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选择难题。《仿佛》的家庭伦理既有对“个别家族制度”的探讨，也侧重对“综合家族制度”的反思。作者将家庭中的代际冲突与社会大历史相互叠合，作品中父子矛盾的背后亦有沉重的历史缩影，构成交互发动的历史叙事景观。本文首先考察精神上与国家保持高度一致的父亲及其立身之本，再梳理主人公的伦理纠葛及其背后的历史缩影，最后结合代际冲突的不同解决方式，进一步探讨近代社会家庭代际的伦理审思。

（一）“文明开化”的父亲及其立身之本

代际关系主要涉及家庭内部成员，如长辈与晚辈之间的辈分位置及其相互关联。五条秀麿家的代际关系，与森鸥外另一部作品《半日》中主人公父亲过早离世，着重刻画母亲与媳妇的矛盾冲突截然相反，《仿佛》中涉及母亲形象的笔墨不多，这主要是由母亲在家庭伦理中所处的从属地位所决定的，母亲对家庭和儿女重大事务没有决定权，一切服从父亲和丈夫的决定，母亲也基本上没有机会涉足家庭之外的社会公共事务，与政治基本无缘，因此母亲的形象并不鲜明。作品中代际关系的不和谐，主要来自“父与子”——五条子爵与五条秀麿的微妙冲突，其中针对父亲五条子爵的描述，如下所示。

父亲子爵成长于《西洋事情》和

《与地志略》盛行的年代里，自学到能用翻译书上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贵族圈内朋友间，说话颇有威信。但从精神方面来看，他除了听过根据朱子注释讲解的《论语》外，没有什么知识。^[7]

《西洋事情》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著作，共十卷（1866—1870）。在此之前，日本虽开设了“洋书调所”，翻译欧洲的书籍，介绍欧洲的地理、历史、科技等，但是“洋书晦涩，难读难解”。而《西洋事情》采用了易于武士阶层接受的语言，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欧洲的历史、地理、兵法、科技、监狱、工业、银行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深受武士阶层的欢迎。该书一经面市，就被抢购一空。据当时的统计，该书的发行数约25万部，创下了同时代个人书籍销售的最高纪录。《与地志略》（1870—1875）由内田正雄编译，以概略的文字和插图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主要城市、重要海港，以及风俗物产等，是明治初期介绍各国概要的启蒙书籍。五条子爵成长于这两本书籍盛行的年代，且对于洋书中的知识能进行些许活用，意喻其与明治政府“文明开化”时代的同步成长。不仅如此，在其精神方面，除听过根据朱子注释讲解的《论语》外没有什么其他知识的背后，是日本儒教对中国儒教的继承与变革。倡导绝对忠诚的朱子学，不仅是日本德川时代的官学，也被明治政府看中，用来塑造国民的忠诚。日本儒教继承了中国儒教重视家族道德的传统，但在维持封建体制的过程中，“忠”取代“孝”占据了核心地位，“对家长尽孝

的精神，与对君主尽忠的精神是同种精神”。因此提倡忠孝一致、将私的领域里对家族的孝，与公的领域里的忠诚心连接起来的日本儒教，是五条子爵精神领域的唯一信条。作品中刻画父亲，正是一位在知识层面及精神领域与国家发展保持高度一致的贵族子爵，其立身之本正是当时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体制最重要的精神结构——家族国家观。

家族国家观是近代日本统治者为维护天皇制，运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原理，将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等同起来，以实现天皇对国民进行统治的国家伦理观。1890年，日本颁布了《教育敕语》，将儒家思想与近代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混杂在一起。在起草过程中，以传统的家族伦理为基调，加上山县有朋、井上毅等“开明派”的近代国家观，再掺进历代统治者编造的天皇神话，建构了全新的伦理意识形态——家族国家观。具体而言，家族国家观主要包括：其一，把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比作父子关系及本家与分家的关系，将天皇统治正当化、绝对化。其二，运用祖孙一体、祖先崇拜的传统和血统关系的信念，奠定近代君臣关系的基础。其三，强烈的忠孝一致的伦理道德，“在家能孝者，即在国能忠者”，孝被用于作为家之扩大的国家，成为国家道德的基础。五条子爵的伦理身份，决定其必然站在拥护天皇制的立场上，将日本儒教与近代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相融合而建构的家族国家观，又恰符其注重朱子儒学又“文明开化”的知识结构形成，因此，子爵对家族国家观的拥护与支持可谓不言而喻。

然而，即便是在知识层面及精神领域与国家发展保持高度一致的五条子爵，当频频收到远赴德国留学的儿子关于学问、

宗教及政治相关的来信时，也会对其立身之本的家族国家观产生思考。

自己祭祀祖先只是形式，没有实质内容。即使努力去想“祭如在”，其努力也是徒劳的。不！不存在什么徒劳的努力，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这就符合了儿子所说的教育破坏信仰这一观点。果真是这样的吗？似乎如此。接受了现代教育，恐怕就不能将神话与历史合二为一去考虑。…在清楚地划分开神话与历史的同时，就会怀疑祖先的神灵之类是否存在。如此一来，继续思考下去岂不是极其危险？[8]

尽管子爵自身也会对祖先神灵存在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但比起对真实的探索，子爵更担心如儿子一般如果接受了现代教育，则会质疑神话的合理性，“一旦点明神话并非历史，恐怕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会开始崩溃”，可见以混淆神话和历史作为立论之本的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正是子爵最重要的信仰，一旦对天皇制产生怀疑，则进而会影响到国体的正常运转。这由现代教育导致的信仰危机，与子爵自身所拥护的家族国家观的两面性不无相关。一方面，儒教忠孝主义和日本家族制度的传统确实为家族国家观提供了思想和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建立在封建道德之上的日本儒教，以等级秩序为前提的忠孝主义，从性质上而言是前近代的，这与明治致力于建立的近代国家相抵触。尽管通过多种方式，包括打破身份隔离和将忠诚度集中于天皇一人等，对儒教忠孝主义进行了修正，但由于内部包含了近代和前近代的两种因素，家族国家观自建构初期开始就包含着悖论，近代化的过程就是打破

封建传统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定带来社会的变化，最终会导致把国民从家族等前近代的集团束缚下解放出来，分解为自由、平等的个人。在明治政府的近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中，民众原有的封建忠诚逐步被侵蚀，反而动摇自身的统治基础。这也导致五条子爵在与儿子的书信交流中会受影响而引发针对自身拥护的家族国家观的反省和联想，但子爵还是会尽量回避宗教、政治等敏感问题，回信仍以勉励儿子成为国之栋梁为主。因而就五条子爵个人而言，原本身处贵族阶层，成长时代与明治国家发展几近同步，在与国家保持高度一致的精神层面上，几乎是坚不可摧的。

综合上述，作品中的父亲是一位以家族国家观作为其立身之根本的贵族子爵。由于自身内部包含了近代和前近代的两种因素，家族国家观自建构初期开始就包含着悖论，这也导致父亲在多次收到留洋海外的儿子关于学问、宗教及政治相关的来信时，会引发针对自身信仰的诸多反省和联想。然而，在与儿子的书信交流中，父亲会尽量回避敏感问题以确保自己人生中最重要东西不会面临崩溃，在精神层面上与国家保持高度一致，是五条子爵这一辈人的使命与信仰所在。

（二）主人公的伦理纠葛与历史缩影

作品主人公五条秀磨是一位主修历史学的青年学者，在国内完成了大学阶段的学习后，父亲将其送往德国留学。针对儿子的出国留学，父亲子爵的想法与当时明治政府鼓励贵族去海外游学“开智研才要在着眼宇内开化之形势，修有用之业，或去外国留学，讲实地之学”的倡导保持高

度一致。

让孩子上大学，以及将他送到国外去读书，目的并不是要求他今后从事一门什么专业。孩子将来继承家业，蒙浩荡皇恩，也会被加官进爵，因而其举止言谈要与身份相符。他需要学习一定的基础知识，为此就必须接受比普通教育更高的教育。^[9]

身为贵族子爵家的嫡子，五条秀磨的未来之路似乎早有定数，继承家业，加官进爵，伦理身份决定其今后成为皇室藩屏，维护国家体制的立场基本不会改变。作为父亲对儿子的期许，是寄希望于他早日成为国之栋梁，留洋的最大成效是提高言谈举止的高级感，从而与其贵族身份相符合，至于是否学到什么专业知识并不在父亲的重点考虑范围之内。然而，作为儿子的五条秀磨，经过三年多的留洋历练，在德国耳闻目睹了皇帝与学者的君臣之交、政治与宗教信仰的冲突与交融后，在理解学问、宗教及政治等诸多领域的认知方面，与父辈略知皮毛的初级阶段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在他与父亲的书信交流中，特别强调德国的学者并不会为了一点政治上的目的而扭曲神学教义，国王也不会强迫学者这样去做，并以德国的民主政策来类比俄国的教化愚民政治。回国后致力于研究日本国史的五条秀磨，作为主张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实证历史考察的青年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企图将日本国史中的“神话”和“历史”相分离，但这又与以混淆神话和历史作为立论之本的天皇制国家体制相悖，学问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和作品背后的历史缩影息息相关。

1868年，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

开始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史称“明治维新”。在近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日本的国家认同是在排除了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对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扩大氏族共同体的外延来实现‘民族认同’的方式加以实现的”。天皇作为民族的精神领袖和最高首领，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最高权力，对国家的认同也就简化成为对天皇的认同。实现日本国家认同的核心所在，就是通过对天皇的顶礼膜拜，日本人将“国家”这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从而得以迅速实现对国家的认同。明治政府成立后，随即宣告一切回复到“神武创业之始”，保留天皇传统的、独特的机构和制度，各项命令均以“谕旨”、“敕谕”的形式下达，欲借皇权加强统治的合法性，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且将一切权力集于天皇一身。因此，明治新政权的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除了不断加强和完善天皇制政权机构，完善政治结构之外，从意识形态领域重树天皇的神统形象是重中之重。

明治政府在树立天皇神统形象，建立和巩固天皇制意识形态方面发布了一系列的施政纲领和政策。其一，恢复神社神道，继续沿用封建时期的教化政策，利用古神道教宣扬天皇是日本祖先神的子孙，延续《古事记》、《日本书记》等古籍中的神话，为天皇神系血统提供历史依据。建立国家神道，重新确认天皇的宗教领袖地位。其二，制定和颁布《明治宪法》，“大日本帝国系万世一系天皇之统治”，以法律形式确保天皇神权的不可动摇，强调其统治的正统性。其三，颁布《教育敕谕》，宣扬家族国家观，把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功能运用于国家统治，使家族制度发展成为国家政治、伦理、法律，赋予天皇

以父权、君权、神权，要求国民服从天皇父家长的统治。其四，在学校教育上，采取培养“忠君爱国”臣民的天皇制民族主义教育路线，“尽力形成顺从天皇制国家且具有适合于形成顺从天皇制国家之意识的人的教育”，修订教科书，在《高等小学修身书 第三学年儿童用书》等书中加入“天孙降临”等相关叙述。这些措施和手段都借用了神道教的话语体系，肯定日本国体的正确性与合法性。

正是宣扬“万世一系”天皇神权的言说，诱发了关于“南北朝正统之争”的著名事件。日本南北朝（1336—1392），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段分裂时期，同时出现了南、北两个天皇，并有各自的传承。围绕南朝和北朝哪一方为正统的问题，日本的史学界始终存在不同意见，既有北朝正统说论，也有南朝正统论，以及多数学者主张的南北并立，即同时承认南北两朝廷和各自的天皇。在明治初期中小学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采用了两朝并立说，然而并立说与宣扬“万世一系”的天皇神权存在明显矛盾，显然违背政府在树立天皇神统形象，巩固天皇制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宣传。因而，1911年1月，《读卖新闻》撰写社论，率先批判主张两朝并立说的国定历史教科书，以此为开端，围绕“南北朝正统地位”的讨论就此展开。非难者宣称“文部省官员及少数编写者妄图改窜万世一系之皇统，实可谓大逆不道之举”。最终政府免去编写教科书的主要负责人喜田贞吉职务，将两朝并立说改为南朝正统论，作为此次事件的收场。

在当时的各方讨论中，为天皇制国家体制的建立与强化提供强有力理论支撑的井上哲次郎，甚至提出了“实证史学研究有害论”。井上等人伪科学性的诡辩成

为了当时的御用学说、政府对喜田贞吉的处分、对教科书的修改，均是学问自由被权力随意践踏这一黑暗时代的种种表现。森鸥外作为教科书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可以说是该事件的直接目击者，其作品《仿佛》写于“南北朝正统地位”论争同年年末，通过描写主人公史学研究者五条秀磨纠结于是否该将国史研究中的“神话”和“历史”相分离的苦恼，隐含了作品背后的历史叙述。学问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带给五条秀磨的伦理纠葛也正在于此：一方面，坚守初心进行史学实证研究是秀磨身为学者的信条，若从学术角度来探讨日本神话，必然会发现其虚构性，从而影响天皇神权的建构，明治政府所推崇的欲借皇权加强统治的合法性，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有可能因此被动摇；另一方面，身为贵族子爵家的嫡子，伦理身份决定其理应站在拥护以混淆神话和历史作为立论之本的天皇制的立场上，追求学问和思想上的自由固然重要，但同时还需守护国家秩序的稳定，成为皇室的守卫者。

（三）代际冲突与伦理变迁

相较于在知识层面及精神领域与国家发展保持高度一致的父亲，经过三年多西洋文明洗礼的儿子，在理解学问、宗教及政治等诸多领域的认知方面远超父辈。然而，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主人公，在企图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实证历史研究过程中，依然苦恼于是否该将国史研究中的“神话”和“历史”相分离。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其自身伦理身份与学问自由的冲突，更重要的，则是一旦点明神话并非历史，对其父亲而言，人生中最重要信仰，以混淆神话和历史作为立论之本的天皇制国家意

识形态就会面临崩溃。换言之，主人公执着于实证史学研究，就会在“父亲与自己之间形成一条不宽但却深邃的沟壑”，有可能将父子二人纳入对立状态。对于这一点，父子双方均了然于胸。因此，作为父亲的子爵，在秀磨回国后，对于宗教问题绝口不提，只是暗中观察判断秀磨头脑中敏感问题的扎根程度；作为儿子的秀磨，则依然踌躇于是否该揭发国史构成的虚构性而迟迟没有动笔，只能依靠大量阅读哲学书籍来坚持头脑的锻炼。

在欧洲回来已经一年多，秀磨与父亲的谈话如同对阵双方一样，各自派出侦察兵。一旦发现对方的影子后，就从原处射击一番，然后撤回自己的阵地。没有公开的交火，但也沒有和平时期。^[10]

就代际关系而言，镰仓时代起，日本封建社会家庭伦理模式基本是父权家长制，这一模式也一直延续至近代。由于家庭整体的生存与发展的担子落在父亲身上，与之相应父亲在家庭中拥有最高的权威。父亲决策的目的在于维护家庭利益，父亲的意志代表家庭的意志，父权家长制家庭的伦理核心是以父亲为代表的家族整体利益，父亲对子女有绝对的统治权，类似于君臣关系中的君主。子女则需依赖父亲的帮助而生存和发展，因而孝敬和服从是最基本义务，此外子女还有维护整体家族利益的义务。然而，随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兴起，家庭成员的个体意识增强，原本占支配地位的父权这一传统家庭伦理权威开始受到挑战。上述引用正是对家庭中代际冲突的形象描写。

近代社会家庭代际冲突的产生有着多

方面的原因。首先，就社会原因来说，明治维新以来，文明开化的风潮为人们了解外部世界创造了条件，开始重新审视包括家庭制度在内的封建旧制，促使了家庭代际冲突的产生与激化。西方个人主义倡导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以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为目的。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有过留洋经历的知识分子会因为受过一定程度西方思想的浸润，回国后会对自身所处的日本传统家庭及其制度产生反思，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传统的代际关系势必会诱发家庭成员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其次，在爱情与婚姻问题方面，“女性主义”、“个人主义”的风靡，给传统的爱情与婚姻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给传统的代际关系带来冲击。当子女在追求一种全新恋爱关系和婚姻模式的过程中，很容易与维护家族整体利益的父亲产生冲突，代际矛盾就越积越深，最终形成巨大的代沟。

作品中五条家庭代际关系的不协调，主要来源于两代人在理解学问、宗教及政治等诸多领域认知上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主人公秀磨与父亲子爵之间由于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选择难题。为了不引起父子矛盾的前提下解决困扰其已久的学术与政治的冲突，秀磨引入了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哲学家汉斯·费英格（Hans Vaihinger）的“仿佛哲学”。汉斯·费英格的著作《“仿佛”哲学—人类的理论、实践与宗教的虚构系统》，于1911年4月在德国首次出版发行。在这本书中作者对虚构作了详尽分类，阐述了虚构在诸如政治学、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数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中的运用，旨在说明虚构在知识论中的核心作用。“仿佛哲学”认为，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对现实的

各种现象创立各种“虚构”的解释，“仿佛”相信这种反映现实的方法是有理性根据的，而将有逻辑矛盾的部份忽视，置之不理。“虚构仅仅是一种辅助建构，一种迂回的方案，一种事后要被拆除的脚手架”，按照费英格的论述，“仿佛哲学”非常强调科学虚构的实用性与便捷性。

它实际上是我们说的一种有意识的虚构。但如果人类不假设有点有线的话，几何学就不可能成立。…没有所谓的物质的话，自然科学也不可能存在。…什么自由、灵魂不散、义务等等，这世界上哪里有？但人们真要是这样看问题的话，伦理就不可能存在了。…我们暂且不谈人类的智慧、学问等等，无论是宗教还是其他什么，从根本上来看，事实上都是一种缺少证据的东西，也就是建立在“仿佛”的基础上的。…人生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以“仿佛”为中心的。^[11]

森鸥外在《“仿佛”哲学》发行的同年年末，借主人公五条秀磨之口，将该理论活用于现实问题，写入自己的作品以介绍给了日本读者。秀磨认为人类为了在非理性的社会中安宁地生存下去，就要甘于接受“虚构”与谎言。在“仿佛”哲学中似乎得到了理论佐证，秀磨以“虚构”为前提，既能将国史研究中的“神话”和“历史”相分离，继续自己的史学研究，又能避免与以父亲为代表的以混淆神话和历史作为立论之本的天皇制国家秩序的矛盾冲突，从而保持微妙的父子平衡。秀磨寄希在沟通的基础上与父亲形成和谐有序的伦理秩序，以营造互相理解、和谐美满的家庭氛围。“一些作家，因为自我的觉

醒而走上反抗“家”和国家的道路。…如在“家庭”面前最终屈服的高村光太郎，抽身出逃的永井荷风，设法与家庭求和的鸥外、漱石……”。《仿佛》这部作品亦可窥探出身为家庭调和派的作家将家庭中解决代际冲突的美好向往和对亲情的守望寄托在了主人公身上，“将贵公子五条秀磨视作自己分身的作家”，通过主人公对代际冲突的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自身所提倡的一种新的代际伦理倾向：当代际关系发生冲突或者不协调的时候，试图通过调和的方式去填补这种沟壑。通过互相沟通，协调传统的父权制模式，以维持家庭的和谐美满。

然而，作品中朋友绫小路的登场，不仅直白宣告秀磨这种解决矛盾的方式过分理想，偏离现实，而且在读者眼前展示出了迥然不同的留洋知识分子形象。绫小路与秀磨同样出身贵族，却完全没有遵循既定的人生规划路线，即使其父彻底失望，也立志成为画家，被父亲视为高等游民看待。与秀磨当初大学毕业出国留学的愉悦心情相比，绫小路的出国留学不免有逃避与社会、家庭的矛盾，又想遵从内心志向的目的所在。他规劝优柔寡断、踌躇不决的秀磨像自己一样先解决烦恼，再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如果真是到处碰壁的话，为何不能下决心冲出一条路来”。作品通过对绫小路的描写，刻画出与主人公截然相反的“高等游民”样式的留洋知识分子形象。

高等游民，意指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教养，没有经济压力，也没有固定职业，远离现实社会，秉持超然生活理念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高等游民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颇有相似之处，“19世纪俄国的时代为‘多余人’形象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

壤，同样，20世纪日本的时代背景也为日本的‘多余人’形象出现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肥料”。一方面，游民代表着近代日本经济宽裕，当国家富裕和文明进步时，就会有游民的出现与存在。另一方面，明治时期接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经历过西方先进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在看到转型期日本社会的种种弊端时，会站在批判者的角度去观察、思考社会，却缺乏做出改变、实施行动的行动勇气。“政治上的专制统治，社会动荡，价值观混乱等现状，导致知识分子希望幻灭，精神压抑，悲观绝望”。由于这些知识分子既不愿融入社会，又不能与社会为敌进行改革，最终只能成为现实社会的旁观者，成为赋闲在家的“思索者”，引发一场自我认同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因而，高等游民类的绫小路在处理家庭代际冲突时，会采取与家庭调和者的秀磨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父辈仍然持守古老的传统，推崇父权的尊严和家族的荣誉；受到新时代精神熏陶的年轻一代，为了追求个体的自由与发展，往往会勇于违背父命，不惜把亲情、名誉等作为牺牲。但在当时虚妄的文明开化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勇敢和牺牲并不一定意味着正确的选择，也会埋下悲剧的祸根。

概而言之，从伦理角度来看，《仿佛》这部作品中所体现的代际冲突反映了近代日本家庭代际的伦理变迁，其进步性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作品呈现了近代社会“文明开化”的发展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兴起对传统家庭代际伦理的影响。尤其是伴随经历过西方先进思想浸润的家庭成员个体意识的逐步增强，令原本占支配地位的父权这一传统家庭伦理权威开始受到挑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传统父权衰落的必然趋势。其二，作品刻画了当代际关系发生冲突或者不协调的时候，不同类

型的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既有试图通过调和的方式去填补沟壑，力图消除话语权力纷争、达成代际和谐的家庭调和派，也有为了追求个体自由，违背父命，远离社会的高等游民派。其三，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作家自身的伦理倾向，即提倡一种全新的代际伦理，在互相沟通的基础上协调传统的父权制模式，形成和谐有序的代际伦理秩序，以营造互相理解、和谐美满的家庭氛围。

结语

有别于“日本社会逃亡奴隶”的众多文人，森鸥外的创作立场是欧式的。他和夏

目漱石，都是不断地把“西方化”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作为问题来思考，他们内面的深层问题与明治的整个日本社会问题是一致的。在作品《仿佛》中作者将家庭中的代际冲突与社会大历史相互叠合，所呈现的家庭伦理既涉及对“个别家族制度”的探讨，也侧重对“综合家族制度”的反思。作者不是把家族制度做简单的观念化处理，而是超越单纯的批判和单向度的善恶辨识，以哲学为精神线索，对作品背后的历史叙事，历史、文化与人的伦理审思进行重新编码，使之融入到小说的叙事语流当中，引发读者重新审视家族制度及其伦理道德所迸发出的时代色彩。这种方式，可谓作家叙事能力与小说智慧的真切体现。

注释：

- [1] 井上哲次郎『国民道德概论』，三省堂，1912年，第220页-第228页。
- [2] 唐木順三『鴎外精神』，筑摩書房，1943年，第23页。
- [3] 中野重治『鴎外：その側面』，筑摩書房，1952年，第56页。
- [4] 小泉浩一郎『森鴎外論——実証と批評』，明治書院，1981年，第68页。
- [5] 渡辺善雄「鴎外「諦念」の能動性——「かのように」を視座として」，『文芸研究』，1984年第1期，第75页。
- [6] 野村幸一郎「森鴎外<かのように>モチーフ考」，《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1989年第12期。
- [7] 森鸥外《仿佛》，高慧勤编选，《森鸥外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319页。
- [8] 同上，第139页。
- [9] 同上，第317页。
- [10] 同上，第327页。
- [11] 同上，第332页。

（作者单位：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